

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

王 继 王浩斌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prerequisite of Marxism social modernization thoughts, and points out that firstly such historical prerequisite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Karl Marx's comments on classical civil society theory and social practice at that time. Secondly, Marxism social modernization thoughts' fundamental intentions are modernization prerequisite, impetus, essence, way, principle and tendency. Thirdly, there are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these thoughts. Finally, this study has profound practical meaning to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社会现代化指的是以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传统农耕文明,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社会整合过程,是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变迁和整体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涵着丰富而又自成体系的社会现代化思想,但长期以来,基于以下原因,形成了种种误解:其一是直接原因,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专用语境和理论逻辑等,而未曾直接提出当今学界的专业术语——“现代化”一词,只是用“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工业社会”、“现代社会”等术语来代替,致使个别学者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现代化思想,如果有的话,其“现代化”指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其二是根本原因,即学术同仁大都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形成条件的研究,忽视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前提——对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的深入分析,往往用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分立及其向现代转型所形成的社会现代化运动中抽象出来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化公式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对有关活生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致使大多数同仁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有社会发展思想,如果有现代化思想,也只能作为其社会发展思想的一部分。如此种种误解,致使学界无视或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研究,致使人们一提马克思主义便立刻联想起“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并认为它同当前的现代化大潮格格不入,是“过了时”的理论。为了澄清认识,再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本来面目,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本文试图从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现实价值等几方面入手来展开论述,以抛砖引玉。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离不开思想理论源流及创始人自身的文化素养、心理特点等各种主客观条件,并受其影响、为其制约。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

(一)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形成的理论契机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形成于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西欧,是由洛克、卢梭、黑格尔等自然法哲学家创立的初级形态的“现代化理论”,是对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狭小意义上的西欧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反应。日本学者富永健一认为,“‘现代化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起源。始于洛克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17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占主流地位……我曾经把自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形成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第一阶段的现代化理论”(富永健一,1986:47)。马克思、恩格斯深受这一古典市民社会

^{*} 本论文是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6,1:41)。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中的“市民社会”。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正是在批判继承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并结合当时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古典市民社会理论是伴随西欧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等现代工业社会萌芽的初级形态的“现代化理论”。黑格尔之前的思想家如洛克、卢梭等,尽管有不少关于财产的论述,也不乏对市民社会经济活动的说明,但更多的是透过政治来谈经济,一般都把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认为政治自由是市民社会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市民社会理论更多的是确立了市民社会的政治传统,我们习惯上称他们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黑格尔同洛克等人不同,他通过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市民社会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这种转移是同当时市场经济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古典经济学的成熟等分不开的。黑格尔首次将市民社会看成是政治国家的对立面,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是伴随西欧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出现的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组织状态,是指社会中每个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所有社会程序和社会过程。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黑格尔,1961:197)。“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政治国家——引者注)冲突的舞台”(黑格尔,1961:309)。这样,黑格尔尽管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但他认为由市民构成的社会中,各个私利个人物质追求的无节制性和异质性会导致道德缺陷,需要国家的强制统合才能弥补,同时他把这种国家看成是“伦理理念的现实”(黑格尔,1961:253),并因此而认为“国家高于社会,决定社会”。黑格尔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看到了国家同社会的分离,马克思对此深表认同,“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马克思,1962/1859,1:482)。关于国家同社会相分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永久的对立面、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当然,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分离实际上是存在的”(马克思,1956/1843,1:334)。

马克思在继承的同时又进行了批判。首先,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个人联结为社会的抽象性,找到了研究社会现代化的出发点。黑格尔认为,“各个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的联合,因而是在抽象普遍性中的联合”,马克思认同黑格尔所认为的“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马克思,1956/1843,1:448)。但认为在市民社会,私利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1960/1846,3:29)。这样,马克思找到了研究社会现代化的出发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私利个人)及其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一系列物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种“头足倒置”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认为正是这种“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成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1956/1843,1:369),使黑格尔无法超越历史唯心论。因此,恩格斯认为,“决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恩格斯,1965/1885,21:247)。

由此可见,若撇开黑格尔的结论,只注重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性质和特征的分析把握以及他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他似乎“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1959,1:482)。也可以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而历史唯物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富永健一把“以历史唯物论为先驱……作为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富永健一,1986:47)。

(二)相继发生于西欧的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得以形成的现实依据

在西欧的前现代时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边界模糊不清,甚至完全消失,这是因为国家几乎夺走了市民社会的全部政治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无所不及,政府几乎无所不能,全部社

会生活都处于政治国家的控制之下,个人的私人利益缺乏基本保障,随时都可能遭致国家的侵犯。这样,市民社会湮没于政治国家之中,人们看不到两者的分离。

市民社会同国家相分离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初级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壮大的产物。初级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都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活动摆脱专制政府的家长式统治;而它们之间的冲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为尖锐,最终导致了政治革命的爆发,即1640年和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政治革命使“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马克思,1958/1847,4:154)。传统政治国家被粉碎了,新的政治国家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有力后盾(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在后面将论及,此不赘述)。

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那里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部分权力,社会自主性程度即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和地位大为提高。这种自主性程度的提高正适应了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交换和自由竞争的需要,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展。发轫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利用为标志,从纺织到铁路、采煤、炼铁等主要工业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促进了以生产社会化为特征的工厂制度的诞生和生产方式的全新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大工业的发展,是一次典型的社会现代化运动。

综上所述,政治革命为社会现代化的正常进行创立了历史前提——现代民族国家;而产业革命则直接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典型的社会现代化运动。所有这些,为马克思正确认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及运动规律等奠定了基础。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尽管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但是,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将这些表面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现代化理论,那么就亟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其作指导;而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马克思影响甚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大师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他们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费尔巴哈坚持机械的唯物主义,承认世界观的物质性,但认为这个物质世界是孤立的、无关联的、不可知的,并且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了唯心主义;黑格尔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精神”所支配的一个有机互动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个世界是互相联系的、矛盾发展的、可认知的。对此,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不彻底性,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立场;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

接着,马克思首次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从1844年的“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原理出发,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唯物史观是世界近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实际及运动规律,是对社会现代化实际进程的高度抽象和理论概括;它深刻地揭示出了由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所组成的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变迁和整体发展的态势及运动规律、发展趋势等。这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得以形成的标志,至于后来马克思运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原理对其他一切历史时代进行分析所形成的一般理论原则,习惯上称为“新历史唯物主义”,它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

(四)马克思本人的文化素养、心理特点和艰辛探索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尽管有古典市民社会理论为其提供理论契机、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为其提供现实依据、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其提供借鉴,来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如果他没有洞察一切、怀疑一切的深邃智慧,没有勇于探索的拼搏精神等主观条件的话,那么所有这一切也都只会流于泛泛,绝不会激起马克思产生社会现代化思想的火花。事实上马克思具备了这一主观条件:首先,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富裕而

文明的律师家庭,在柏林大学研究过法学、历史和哲学。其次,在心理特点上,“马克思是这样一类人,他精力充沛,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可动摇的信念”(G. A. 柯亨,1989)。在其自白中,他认为“斗争即是幸福,屈服就是不幸,而‘怀疑一切’是他最喜爱的箴言”(马克思,1972/1865,31:588—589)。再次,在行动上,马克思深入社会,投身实践,亲自参加过1847—1848年的革命斗争,积累了许多社会经验。具备这样一系列主客观条件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形成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依托,首先从客观的历史角度对社会现代化进行了历史定位,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现代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其次,马克思从微观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了解剖,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马克思、恩格斯,1960/1846,3:41)。并且认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1962/1859,13:8)。为此,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发现了价值规律及剩余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的发现揭开了现代社会的全部秘密。资本可以增值使资本成为历史主体的人不断追求的目标,这样,资本就充当了社会现代化的第一催化剂。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或利润的深入研究,发现了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实质、途径、原则和趋势等,而这些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正确反映社会现代化客观实际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其中关于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动力、实质、实现途径、客观原则和发展趋势的论述构成了其基本内涵。

(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社会现代化得以真正开始的前提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伴随商品生产的日益繁荣,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私人的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摆脱政府的家长干预,成为政治活动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这种要求与封建政治国家的专制统治水火不容,冲突在所难免。政治革命则是解决这一冲突的有效方式。“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马克思,1956/1843,1:441)。由此可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来自传统政治国家的束缚,政治革命则打碎了这一束缚,实现了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为社会现代化的正常进行铺平了道路。

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可以完全摆脱政治国家而自谋发展。事实上,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其发展所需,决定了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量的权利;此外,市民社会还需要依靠国家政权来整合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现代化的有序进行。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国家的控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继续传统政治国家的专制统治也不可能。这是因为国家本身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恩格斯,1972/1884,四:166)。它同社会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不可能真正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也不可能切实反映社会的普遍意志。这样,社会现代化要正常进行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需要一个不同于传统政治国家而又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现代政治国家,马克思在上文将这一“现代政治国家”称为“真实的国家”,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后来所称的“现代民族国家”。

传统政治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而“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一个社会将固执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布莱克,1988:87)。这一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使现代民族国家只有不断提高自为性程度才能生存;而其有效途径是通过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的政治行为得到规范,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有合法的依据并依法受到约束。与

传统的政治国家相比,现代民族国家在合法性来源和管理方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合法性来源上,前者主要依靠暴力强迫大家接受,而后者主要是依靠权威——这一权威是指为大家自愿接受和服从的合法化权力。在管理方式上,前者依靠君主的专制统治来管理社会,而后者则通过代议民主制来管理社会。这个代议民主制首先是一种代表制,代表制是民主制的基础,“正如官僚是国家在市民社会中的全权代表一样,各等级(议会——引者注)是市民社会在国家中的全权代表”(马克思,1956/1843,1:327)。其次,代议民主制是一种选举制,选举制是代表制的核心内容,“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象的而且实际存在的关系。因此显而易见:选举构成了真正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利益”(马克思,1956/1843,1:396)。

综上所述,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现代化正常发展的前提,而此前的一切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只不过是政治革命的爆发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充其量只不过是社会现代化的最初萌芽,而不是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开始。

(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需求是社会现代化产生并不断向前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关于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布莱克认为,“如果必须对‘现代化’下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这么说,它是历史形成的各种体制对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一个适应过程,这些功能因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激增而处于迅速变化中”(布莱克,1988:7)。布莱克把在“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激增”的条件下“历史形成的各种体制”的适应力说成是现代化的动力,但他并未道出导致这些体制“历史地形成”和“科学知识激增”的原动力是什么。马克思·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现代化的动力,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充其量只能说在西欧可能是这样。罗荣渠认为,社会现代化的动力是历史发展的合力,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合力,亦即他所说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殊不知,这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再者,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离开了历史主体的人也不会自发地发生联系。罗荣渠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不同的生产有不同的发展机制。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发展进程,这是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性所决定的,而历史上的其他生产方式却没有这种特性”(罗荣渠,1988:20)。他把现代社会的特性概括为“全球性的世界交往”、“殖民扩张”等,但他也未曾解决形成这些现代性的原动力是什么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经济关系入手,通过解剖市民社会发现了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需求动机。恩格斯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格斯,1972/1884,4:173)这里的“财富”主要指的是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尤其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马克思,1979/1858,46上:175)。这是因为只有对货币的贪欲才是一种可持续性的追求,而对特殊财富的追求根本不会催生现代工业社会,正如罗马帝国把从各附属国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都用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一样,最初从美洲掠夺来大量财富的西班牙由于把大量的财富用于战争和购置奢侈品,也没能孕育出最早的现代工业社会。由此可知,只有对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追求才能催生现代工业社会,才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同时,只有讲求社会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利润或剩余价值。这种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需求的心理动机,使资本家变得特别“贪婪”,他们为此而到处去建立联系,到处去探险,这一心理机构成了哥伦布、迪亚士和达伽马的事业动机,构成了科技革命、殖民掠夺和国内掠夺的动机,是社会现代化得以产生并不断向前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资本家一方面对财富特别“贪婪”,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节欲”,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节欲”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原因。首先,“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吝啬,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马克思,1979/1858,46上:183)。这是因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马克思,1972/1867,23:

260)。其次，“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不是向资本家提出的，而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且恰恰是由资本家提出的”（马克思，1979/1858，46上；244）。由此可知，资本家“节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赚来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以便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如果无利可图，如果资本没有增殖功能，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绝不会对现代工业发生兴趣，也没必要去“节欲”；这样的话，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就不会分离，现代民族国家就不会形成，真正的社会现代化也就永远不会开始，更谈不上走向全球化。

（三）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质之所在

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心理动机，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现代生产力呈“指数级”高速增长是现代区别于以往一切历史时代的最为本质的地方，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质之所在。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现代社会也不例外。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力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1972/1846，27；477）。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马克思，1972/1846，4；325）。市民社会就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6，1；41）。这表明，生产力最终决定社会发展，“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1972/1847，1；108）。

现代社会同以往一切社会相区别的本质地方是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传统社会因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素质低下等原因，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现代社会则不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有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8，1；256）？伴随这一生产力高速增长的是日益激烈的竞争、变革和动荡。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而“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8，1；254）。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生产力发展本身来讲，还是就体现生产力发展的“动荡，变革”而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其中最大的区别莫过于现代社会中那种呈“指数级”增长的生产力，这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所在。

（四）利用推动现代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的一切方式和手段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在现代社会，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很多，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提高人的素质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人是主要的生产力。这是因为，首先，“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6，1；24）。其次，“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马克思、恩格斯，1957/1844，2；118）。这充分表明，生产力绝不能自发性地发展，只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存在才能创造出生力；而要创造出呈“指数级”增长的生产力，则必须增强人的体质，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科学文化素质。因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动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天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1972/1867，23；190）。

2. 广泛运用科学技术。“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1972/1867，23；664）。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恩格斯，1965/1883，19；372）。首先，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劳动生产

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力中的应用”（马克思，1980/1858，46下：217）。其次，科学技术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有力手段。“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1980/1858，46下：219—220），“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马克思，1980/1858，46下：34—35）。总之，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

3. 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用机器大工业替代传统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全新变革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8，4：252）。机器大工业应运而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恩格斯，1971/1877，20：293）。

4. 分工和协作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运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马克思，1965/1849，6：499）。“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马克思，1974/1894，25：97）。社会分工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协作也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马克思，1972/1867，23：366）。“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1972/1867，23：362）。总之，“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恩格斯，1964/1868，16：316）。

5. 社会整合能解放生产力。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进化过程，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生产与生态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有效地协调它们的相互对立、促进它们的统一发展即社会整合就成为社会现代化有序进行的条件，而有效的社会整合又往往以一种权威性的社会控制系统的存在为其必要前提，例如进行协作的“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组织起来吗”（恩格斯，1972/1873，2：551—552）？这样，社会整合能为社会现代化的有序、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能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五）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9：19）。然而在现代社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的利益驱动、不断扩大的现代化工业化生产、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人对自然的无情掠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人类正面临着人口快速膨胀，耕地急剧减少，水陆全面污染，资源成倍损耗，全球气候异常，生态整体失调，自然灾害频发，道德日益沦丧，人们信仰失衡，世风江河日下等多病缠身的世界。马克思所处时代正值社会现代化日益发展，并且出现自然与社会双重危机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正是在批判旧有现代化理论不合理性以及批判社会现代化“失序”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批判“现代化病”的基础上从生物有机体的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1979/1849，42：95）。其实，马克思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原则而提出的，其主要内涵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解决途径。

首先，在人与自然的对抗性关系上，马克思首先揭露了人们对土地的破坏和滥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

1972/1858, 23: 553)。“后者^①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马克思,1975/1894,3:917)。其次,马克思也揭露了对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破坏。他认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从来就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相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就不起作用。“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马克思,1974/1868,32:53)。“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马克思,1975/1894,3:289)。

其次,在人与人的对抗性关系上,马克思首先指出这种对抗来源的物质性。“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马克思,1962/1856,12:4)。

再次,马克思还指出了这种对抗性来源于“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对抗性,马克思也曾认为,人“类”的才能发展,从一开始就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要靠牺牲整个阶级才能实现。

最后,针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抗性发展而形成的不可持续性,马克思提出了解决的最佳办法,就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用新的公有制结构代替私有制结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了顶点”(恩格斯,1971/1877,20:307)。“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马克思,1975/1894,3:926—927)。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这一点,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和挑战”(艾森斯塔德,1988:49)。

综上所述,现代工业文明所形成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使社会发展达到了“增长的极限”。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现代化能否继续向前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必须恪守的客观原则。

(六)世界走向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趋势

资本的可再生性使资本极具扩张性,这是因为要实现最大的利润和效益回报客观地需要一个巨大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只要这个世界尚未完全开发,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相对落后地区,资本家就会设法去建立联系,去探险,去“践踏人间的所有法律”来达到目的。这种十字军东征式的“宗教式狂妄”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由一个地区向整个世界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资本家因此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伴随生产力、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局部的、地方性市场发展成为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8,1:254—255)。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深入,世界联系的日益密切,民族国家的历史逐渐为世界历史所取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1960/1846,3:51)。这种向世界历史的转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马克思、恩格斯,1960/1845,3:52)。世界史的形成不是一向都存在的,而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世

① 指小土地所有制。——引者注

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1979/1857,46上:48)。

世界走向一个整体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走向完全趋同,形成一个“地球村”,这是因为各民族有各自的特长,现代工业的特点,也“在于它产生特长和专业”(马克思,1972/1847,1:135)。这样,在高度的社会整合过程中必定存在高度的社会分化,社会现代化进程就是高度的社会整合和高度的社会分化的有机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主要特征

和马克思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从出发点 to 内容再到方法论都独具特色,具有与众不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位历史老人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睿智和高超的逻辑艺术。

(一)在出发点上,马克思注重物质生产发展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在马克思时代,西方的其他社会学家要么从现代工业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成就出发,高度称赞现代工业文明,并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要么从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出发,针对现代工业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等,认为现代工业导致的是人的畸形发展,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并且认定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坏的制度。马克思则从历史主体的人及其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把物质生产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用社会现代化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当今我们时代遇到的最好的制度同时也不是最坏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文明成果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全面锻炼的机会。首先,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人只有通过生产劳动才能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对象性产品,人的能力也从而得到确认与发展,现代大工业则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和展现自己劳动能力的机会与场所。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1960/1846,3:295)。现代工业社会则为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交往,以及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进行普遍的交流,逐步摆脱个体、地域和民族的狭隘性,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创造了条件。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实”(马克思,1972/1847,1:135)。“有个性的个人”,则是指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人;而“偶然的个人”则完全相反。现代工业所导致的社会联系的广泛交往机会的扩大促使“偶然的个人”不断地为“有个性的个人”所代替。

单纯的物质生产会导致人的畸形发展、道德沦丧等恶果,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代价”而全面否定现代工业生产,全面否定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做只能是因噎废食,因小失大。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言,只要遵守可持续发展这一客观原则,我们就能缓解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危机,促进社会进步。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1974/1893,39:148)。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72/1848,1:273)。如此,就可以实现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了每个生产者个人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二)在内容上,强调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前提、动力、实质、实现途径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入手,论证了社会现代化的发生及其在各民族之间的传播并非某种宗教的、不可捉摸的随机性因素的影响所致,而是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充分发育的必然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分工和世界交换的必然结果。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意愿如何,它都客观存在并以其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由中心向边缘传播着,这就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来源于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

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1972/1867,23:8)。这表明,不管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发展差距有多大,最终都将走向现代化,这是具有“铁的必然性”的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社会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步入现代化只有早晚之分,而无可能与不可能之分。但各国、各地区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有不同的特长和不同的现实条件,这就决定了各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异彩纷呈、百花齐放。这就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方式的多样性。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极为关注,认为俄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为不同,并从分析俄国的农村公社的特点性质等入手,认为俄国极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社会形态来实现其社会现代化。这就表明,东方的后发型现代化道路与西方早发型现代化差异甚大。事实上,同在西方的早期现代化国家之中,其现代化模式也绝非雷同,而是大同小异。

(三)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出发,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物质交往关系,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从分析商品开始,先后发现了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规律,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掘了社会现代化的动力、实质、实现途径、发展趋势等,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科学原则,也就是理性原则和逻辑原则。

然而,光凭科学的实证原则很难全面地把握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问题,譬如,伴随着物质生产和科技发展而来的价值危机、道德危机问题;再如,最大限度的利润和社会效益是社会现代化的动力系统的核心内容,但如果没有人的主观动机,它也不能自发起作用。这就涉及到人的伦理价值观。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价值原则,例如现代化的动力看上去好似强调唯意志,实际上其内容是客观的。面对现代化工业带来的道德危机等,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工业的重大革命意义,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终极关怀”的层面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客观原则。

由此可见,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具有互补性。单纯从一种原则出发来研究社会现代化很可能会导致唯生产力论或唯意志论。马克思一开始就把物的发展同人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在其社会现代化理论中实现了有机统一,取得了相得益彰之效果。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揭示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而健康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认为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是现代化进程的实质之所在,这就要求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是社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这就明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必定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一要求的核心内容即是提高社会的自主性程度,即社会受到承认和保护的权利和地位的提高。这就要求国家放权于社会,扩大社会自主权,继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继续坚持“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还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必须遵守的客观原则,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江泽民,1997)。实行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

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等。最后,现代化的最终趋向是世界走向一个有机互动整体,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改革应面向世界,主动与世界接轨,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实行对外开放。

(二)有利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国家权威,保障社会现代化有序进行

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为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特征,是其合法性来源于权威而不是权力。单纯的权力意味着强制和暴力,而权威则是指为大家自愿接受和服从的合法化权力,由此可知,权威是现代国家合法化的根基,是维持和巩固国家统治的基础;同时,国家权力覆盖范围广并不同时意味着拥有足够的权威,而恰恰是国家权力覆盖过广以及权力行使方式上存在的种种偏差是形成国家权威性不足和社会自主性缺失的总原因。在现代化社会,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就能获得权威,否则就会丧失权威。为了增强国家权威,保障社会现代化的有序进行,这就要求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也就是对国家权力作用范围和方式的调整,把本属于社会的自主权还给社会,国家只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这其实就是划清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包括企业)的疆界。党的十四大对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明确的认识,认为“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江泽民,1997)。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还必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机制,防止国有权力可能对个人权利的越界和侵犯,或国家权力误入极个别人手中被滥用而导致腐败。为此,“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江泽民,1997)。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还需要探索合理的政治参与方式,为此我们必须健全民主制,完善选举制,继续搞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

(三)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的关系,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束缚着人们头脑的对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误区。其表现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和政治革命,甚至形成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的潜台词。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属于社会发展的范畴,而社会发展同社会现代化从其产生上来看,就有很大的差别,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运动变化过程,我们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例如现代化大工业、科技革命等。而社会发展思想最初是从社会现代化的具体运动中高度抽象出来的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的一般原理,我们只有在社会形态发生更替,社会急剧动荡发生质变的时期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其次从其主要特征来看,社会发展思想以革命与批判为主体,而社会现代化则以建设与整合为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替可以跨越阶段,例如东方道路中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的出现即社会现代化则是不能跨越也是不能回避的。

从社会现代化来看社会发展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形态,但并不能就此而认定社会现代化就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社会主义化。事实上,资本主义尽管同社会现代化的产生基本上同步,但社会主义更能解决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四)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除了社会发展思想外,还有其丰富的社会现代化思想,即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包括“斗争”的学说,更包括“建设”的学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把“斗争”的学说同社会现代化直接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致使毛泽东思想混淆了社会发展同社会现代化的区别,把社会现代化当作为社会制度服务的手段而忽略了它同时是目标,“一切为了社会主义”是那个时代的呼声,这使毛泽东误入了社会现代化只是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的理论泥潭,致使社会主义优越性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而一些现代化建设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邓小平正确地认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和社会现代化在本质上(即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生产力标准”。实践表明,改革是促成“社会主义”同“现代化”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C. E. 布莱克, 1988,《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

G. A. 柯亨, 1989,《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重庆出版社。

S. N. 艾森斯塔德, 1988《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 1964/186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

——, 1965/1883,《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

——, 1965/1885,《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

——, 1971/1877,《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8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73,《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 1974/1893,《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

富永键一, 1986《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国外社会科学》第10期。

黑格尔, 1961,《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江泽民, 1997,《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罗荣渠, 1988《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马克思, 1956/184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1956/1843,《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1958/1847,《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卷,人民出版社。

——, 1962/1856,《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

——, 1962/1859,《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

——, 1965/1849,《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65,《卡尔·马克思自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46,《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46,《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47,《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67,《资本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

——, 1974/1868,《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

——, 1974/1894,《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

——, 1975/1894,《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 1979/184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 1979/1857,《经济学手稿——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

——, 1979/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

——, 1980/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 1957/1844,《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 1960/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46,《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 1972/1848,《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普列汉诺夫, 1959《普列汉诺夫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1989,《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王继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王浩斌系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宛丽